

二十五史随笔

日暮月升

明史随笔

廖可斌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二十五史随笔

K204.1/14

日落月升

明史随笔

廖可斌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 者 廖可斌
丛 书 名 二十五史随笔

责任编辑 邹 亮
封面设计 张妙夫
封面题字 池长尧

日落月升·明史随笔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)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130000

印 张 6.125

插 页 2

印 数 0001—5000

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
2000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39-1300-0/I·1163

定 价 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1 朱元璋的战略决策
- 7 元末明初的“皮”与“毛”
- 17 天下奇男子王保保
- 23 朱元璋的忌讳
- 28 朱元璋的反贪决心
- 31 科举考试的地区平衡问题
- 35 开国君主的太子往往不能顺利继位
- 50 朱棣为何能篡位成功
- 61 和尚少师姚广孝
- 68 建文帝的下落
- 75 成祖的杀人术
- 80 “靖难之变”中的江西人
- 85 朱高炽的夫人儿子外交
- 93 名臣难过儿女关
- 98 景帝与于谦
- 102 残忍的殉葬
- 105 成化皇帝的畸恋
- 113 “模范皇帝丈夫”弘治帝

ADA 60/04
•1•

目 录

121	不当皇帝当将军	1
130	敢杀皇帝的小宫女	2
139	胡宗宪与戚继光	3
146	严嵩与嘉靖中后期文坛	4
157	可怜的煮贞	5
168	啼笑皆非“争国本”	6
175	千古奇冤袁崇焕	7
182	奈何生我帝王家	8
189	后记	9

朱元璋的战略决策

在元末群雄中，朱元璋并不是最早起事的，很长一段时间内力量也不是最强的，但他却能崛起于群雄之中，二十五岁赤手空拳投奔郭子兴，四十岁那年即登上皇帝宝座。其中原因自然很多，但他的战略决策正确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。在他十几年间作出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中，有两项决策又尤为关键。

第一项是他攻下集庆（今南京）作为基地后，采取了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”的稳步发展的战略。元顺帝至正十五年（公元1355年）郭子兴卒，朱元璋开始独立发展。至正十六年他率军渡江攻克集庆，至正十七年攻克常州、徽州、池州、扬州等地。大将邓愈向朱元璋推荐了徽州儒士朱升，朱升向朱元璋提出了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”的建议，朱元璋深以为然。在接下来的关键几年里，他也确实是按这一方针做的。

考察一下当时全国的局势与朱元璋所处的环境，我

们就知道朱升的这个九字方针实在是审时度势，精辟之极，其价值不亚于诸葛亮著名的“隆中对”。就全国而言，当时群雄并起，早已形成割据的局面。北方是察罕帖木儿等人的天下，中原是韩林儿、刘福通的地盘，湖广、江西一带是徐寿辉、陈友谅的地盘，江南、浙西等地则是张士诚的地盘。这几支力量都远比朱元璋强大。另如占领浙江沿海的方国珍、占据四川的明玉珍、占据福建的陈友定等，实力也在朱元璋之上。仅就朱元璋所占领的集庆一带而言，元将定定扼镇江，别不华、杨仲英屯宁国，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，八思尔不花驻徽州，石抹宜孙守处州，其弟厚孙守婺州，宋伯颜不花守衢州，而池州已为徐寿辉部将所据，张士诚占领平江（今苏州）后正向浙西一带扩张。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情况下，如轻易发动大规模的进攻，向外扩张，就很容易导致周围之敌乘虚而入，使好不容易获得的基地落入他人之手，从而变得无立足之地。比较可取的战略就是实行谨慎的蚕食战略，向集庆周围城市发动一系列小规模战斗，逐步占领它们，形成对集庆的一道保护圈，从而立稳脚跟。这就是所谓“高筑墙”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朱元璋筑起的这道墙对保卫集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他与周围强敌的拉锯战都在这些周边城市进行，不至于让敌人动辄打到集庆城下。而一直保持集庆这个基地，对朱元璋的力量逐步发展壮大以至统一全国至关重要。

所谓“广积粮”就是要军队生产自给。当时军阀们都

靠搜括老百姓维持军用开支，每到一地，烧杀掳掠无所不为，自然得不到民众的拥护，土地、城池往往旋得旋失。朱元璋志向远大，立志成就一番大业，因此他的军队军纪严明。但军粮从哪里来？就在朱升向朱元璋提出“广积粮”的建议后不久的至正十八年（公元1358年）春，朱元璋就任命自己的得力干将康茂才为营田使，主管军队生产自给和辖区内的农业生产。不久，朱元璋见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唯有浙东婺州（今金华）一带可以拓展，遂率军攻取，然后在这一带兴办学校，发展农业，使之成为集庆的后方依托。可以说，“广积粮”不仅是个经济战略，也是一项政治战略。它使朱元璋辖区内的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，也使朱元璋的军队保持了良好的纪律。

当时韩林儿、徐寿辉、张士诚等都已分别称帝称王，因而成为察罕帖木儿等忠于元朝的大军的主要攻击目标。他们都与元朝大军展开过大规模较量，双方都伤亡惨重。另外，群雄之间互不相让，张士诚与韩林儿之间，徐寿辉、陈友谅与韩林儿之间等，都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冲突。唯独朱元璋长时期内一直未与元军正面交锋。也因为他“缓称王”，因而能与已称帝称王的诸强虚与委蛇。至正十五年韩林儿遥授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，张天祐、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。朱元璋虽然“慨然曰：‘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’”，但还是“念林儿势盛可倚借”，乃用其“龙凤”年号以号令军中，直到自立为明时为止。当时察罕帖木儿破山东红巾军，江淮震动，力量最强，朱元

璋也“遣使通好”，也就是表示归顺。元朝派了户部尚书张昺、郎中马合谋通过海道入长江至集庆，任命朱元璋为荣禄大夫、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赐以龙衣御酒。刚到集庆，察罕帖木儿被刺，其军瓦解，朱元璋遂不接受任命，杀了马合谋，因为张昺有才能，把他留下，任命了一个官职。不久察罕帖木儿的继承人扩廓帖木儿视师河南，军势复振，朱元璋又派使者通好，凡七上书，扩廓均扣留使者，不予答复。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也曾有过和议。总之，朱元璋“缓称王”，不当头，就为自己实施灵活的外交策略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。我们不必责备朱元璋奋斗过程中竟然有这么多向“敌人”屈膝求和的不光彩历史纪录，有这种看法即属于书生之见。在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环境里，并没有固定的敌我之分，保持生存和求得发展才是最重要的，否则一切无从谈起。因此必须随时调整战略，趋利避害。正是在“缓称王”的前提下，朱元璋逐步积蓄实力，在其他诸强把元王朝的军事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以后，他动如脱兔，后发制人，以迅雷闪电之势，风扫残云，统一了全国。

说朱元璋全靠投机取巧夺取了天下，又不尽然。当时几支最强的力量中，察罕帖木儿和韩林儿在相互拼杀中两败俱伤了，但分踞朱元璋东西的张士诚、陈友谅（他杀徐寿辉自立）依然很强。陈友谅兵力远强于朱元璋，且有居于上游之利。张士诚盘踞最富庶的江南、浙西一带，财力雄厚。他们都与朱元璋势不两立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

不可避免。当时朱元璋腹背受敌，陈友谅也一再邀张士诚夹击朱元璋，共分其地，朱元璋的处境非常危险。是主动出击，还是被动防守？如主动出击，是发兵西上，还是挥师东下？这时候朱元璋作出了他夺取天下过程中另一个最关键的决策。当时他的谋士、部将们在应主动出击这一点上基本一致，但大多认为陈强张弱，应先东后西。朱元璋说“不然”。张士诚虽兵力不如陈友谅，但也不弱，且财力雄厚，足以支撑较长时期。如久攻张士诚不下，陈友谅野心勃勃，急于独霸，必倾力来犯，那时首尾不能兼顾，必败无疑。如发兵西上，先与陈友谅决战，张士诚为人犹豫不决，只想坐收渔翁之利，必不会袭我后方。待全力解决陈友谅后，再东指张士诚，必将势如破竹。众人都赞同朱元璋的决策，于是全力西进，于至正二十三年（公元1363年）七月，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。这是朱元璋夺取天下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次战役。陈军号称六十万，联巨舟为阵，楼橹高十余丈，绵亘数十里，旌旗戈盾，望之如山。朱元璋兵少船小，士兵站在船上往往连陈军的船沿也够不着。但朱元璋身先士卒，几次陷入重围中，朱军愈战愈勇，以弱胜强。在混战中，陈友谅从船中探出头来观察情况，被朱军将士一箭射穿头颅。于是陈军瓦解，大败而归。朱元璋乘胜追击，次年初即迫使陈友谅之子陈理归降，占领陈氏的全部地盘。尔后朱元璋挥师东下，攻灭张士诚；继而发兵北上，赶走元帝，同时派兵收降方国珍，消灭陈友定以及明玉珍之子明昇，犹如秋风扫落叶，势不

可当。在鄱阳湖之战后四年，他就基本统一了全国，建立了大明王朝。事实证明，他当时选择“先西后东”的战略，是洞察敌情后作出的正确决策。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激战时，张士诚除曾派小股军队骚扰朱元璋后方外，果然几乎按兵不动。至正二十五年十月，朱元璋以全胜之师对张士诚发起总攻，直到次年十一月才攻下湖州、杭州等外围城市，形成对平江的包围；又直到至正二十七年九月，才终于攻下平江。倘若朱军当初“先东后西”，必定久攻不下，陈友谅乘机来犯，朱元璋必定全军覆没无疑。

打天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最关键的也就是那么几步，成败皆系于此。因此关键时刻的战略决策是最重要的，古今中外都不例外。

元末明初的“皮”与“毛”

当代一位名人说过一句名言：知识分子是毛；人民大众是皮，知识分子必须与人民大众相结合，否则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。这里所说的“人民大众”，也可以理解为由政治家、军事家们率领的革命队伍。因此这里所说的“皮”与“毛”的关系，实质上就是政治家、军事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。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，而有很强的依附性。他们必须依附一定的政治、军事力量，否则干不了什么大事，甚至生存也成问题。这位名人精通中国历史，他对现实问题发表的许多精辟见解，实际上都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为底蕴。他的“皮毛论”也不例外。据此观察中国古代的许多历史现象，我们会有庖丁解牛、迎刃而解之感。

且说元朝末年，全国存在两个重要的文人集团，一个是吴中文人集团，一个是浙东文人集团。为何它们都在江南？一是因为唐宋以来，东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，文化中

心也随之出现南移的态势；二是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，重用蒙古人、色目人和北方的汉人，歧视南方人。他们不太重视汉族文化，科举考试制度长期废置不行，选拔官员多取自刀笔吏和武将。南方汉族知识分子失去了登上仕途的机会。即使入仕，也只能担任一些佐贰卑职，很难有致身通显的希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量南方知识分子都选择了隐居不仕的生活道路。那些家境富裕者，不做官照样锦衣玉食。因为不必穷年累月钻研科举考试之道，又没有官场公务和种种客套的束缚，他们反而有了充裕的时间和精力，从事与个人兴趣有关的事情。有的遂专心致志地讲习践履两宋以来得到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，有的则从事诗文、散曲和戏剧创作以自娱。于是有元一代，特别是元代末年，南方理学名家辈出，诗人猬兴。当时凡想做官的都往北方跑，凡有志于文化艺术的都流向南方。由于文化传统和其他各方面的原因，南方文化事业又相对集中在现在的浙江、江苏、江西、安徽、福建五地，而尤以吴中和浙东两个文人集团最为活跃。

当时的吴中地区，以平江（今苏州）为中心，西及无锡、江阴等地，东至松江，还包括现属浙江的嘉兴、湖州等地。这一带是全国著名的粮食和桑麻产区，又兼有渔盐之利，人口众多，交通便利，城镇繁荣，商业发达。元代末年，各地农民起义军蜂起。至正十三年（公元1353年）五月，盐贩张士诚起兵，十六年二月破平江，二十七年九月为朱元璋集团所灭。在这十余年间，元朝的军队与

农民起义军之间，元军的各派系之间，农民起义军的各个派系之间，正在中原、关陕和楚中等地鏖战。张士诚集团属于打着帮元王朝扑灭红巾军旗号的所谓“义军”系，与元朝一直保持着时降时叛、若即若离的关系，又没有胆量出兵与群雄争锋，只图保境自守，企图坐收渔人之利，故吴中一直比较安定，外地躲避战火的人多流寓于此。张士诚为人颇为宽厚，轻财好施。起事不久，即筑景贤楼，开弘文馆，招礼儒士，信用文吏。其弟张士德封楚国公，官平章，总揽军政，尤能礼贤下士。其他重臣如左丞潘元绍、参政饶介等，周围也集中着大批文人。许多文人都进入张士诚的幕府任职，如杨基曾任记室，徐贲、张羽都曾被任为属官，陈基任学士院学士，张宪任枢密院都事，陈汝言任参谋，张经任松江府判官，钱用壬任参政，苏大年任参谋，陈秀民任翰林学士，姜渐任行省都事等。高启、余尧臣、宋克等可能也曾受职，杨维桢、王逢等虽未受职，但都是张氏集团的座上客，曾为其出谋划策。总之，当时居留吴中的著名文人，几乎被张氏集团囊括无遗。

与此同时，吴中的大地主、大盐商们也都建筑园亭池馆，养女优，玩古董，招延名流，咏诗作文。在一些有钱有势之人的倡导下，吴中还定期举行诗社活动，请著名诗人品评高低，给予奖励。当元代末年遍地战火满目狼烟之时，吴中俨然成为新的“稷下”、“邺下”，成为全国文学活动的中心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平江即被朱元璋集团攻破了。朱元璋

集团的主要军事、政治领袖，都是淮西一带的下层贫民。淮西地区当时十分贫瘠，朱元璋等人青少年时期都曾饱受饥寒流离之苦。长期浴血奋战的军旅生活，也使他们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。这种淮西农民和武人的身份经历，使他们对贵族地主阶级奢侈豪华生活有一种本能的痛恨，对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心理。他们掌握政权后，便用一种近似恶作剧的方式来捉弄、折辱士大夫，摧挫其自尊心。吴中当时富甲天下，吴中世族向以生活奢华著称，而且朱元璋认为张士诚之所以失败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和他的部下耽于享乐，天天与一班文人墨客在一起。因此，朱元璋攻下平江后，即召集投降和被俘的张氏僚属，警告他们不得故态重演。

张士诚占据吴中，没有给当地世家大族造成太多危害。朱元璋军队包围平江，吴地人在几乎无险可守的情况下，顶住能征惯战的朱元璋军队的猛烈进攻，为张士诚固守十个月。城破之前，张士诚将征收赋税的鱼鳞图册烧毁，意在保护吴中百姓。故张氏灭亡后，吴中人颇为怀念他。朱元璋对此极为恼怒。他取当地富豪沈万三家的租簿定额，按私租收取公田赋税，大大加重了吴中人的负担，很多人家因此破产。朱元璋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移民，把平江一带的富民迁移到凤阳、南京等地。迁徙之民不许私自回原籍，清明节回故乡扫墓只能装扮成花鼓艺人，据说有名的凤阳花鼓即由此形成。经过这些打击后，吴中经济

繁荣的景象荡然无存，吴中文化也就失去了物质基础。

如前所述，张士诚集团属于元末的“义军”系，张士诚还接受了元朝所封的太尉官职，因此吴中士大夫多认为追随张氏，也就是效忠元朝。当今许多人认为，明王朝以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为口号，肯定受到了所有汉族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，其实这种看法属于想当然。实际上当时的士大夫脑海里的君臣观念远比民族观念牢固，他们对元王朝是有感情的。元朝统治者被赶出中原后，许多吴中士大夫还写诗表示怀念。至于属红巾军系的朱元璋集团，吴中士大夫出于地域上的优越感，本来就很蔑视他们，甚至把他们视为信奉魔教（明教）的“妖贼”。陈基极力丑诋朱元璋集团的文章，终明之世一直保存在他的《夷白斋集》中，流传至今。朱元璋占据集庆时，贝琼就写诗讽刺道：“两河兵合尽红巾，岂有桃源可避秦。马上短衣多楚客，城中高髻半淮人。”反映了吴中士大夫对红巾军和楚、淮之人的敌视。明朝开国之初一些“不成体统”的政治措施，他们也表示鄙夷。如袁凯《咏蚊》诗讽刺明王朝之建立是“东方日出苦未明，老夫闭门不敢行”。明王朝对士大夫特别是吴中士大夫的种种打击，更使他们产生对立情绪，不愿与新朝合作。如苏州人姚润、王谟拒绝任职，被处死刑，全家籍没。寄寓苏州的戴良辞官触怒朱元璋，在旅馆上吊自尽。王逢、丁鹤年、杨维桢等累受征辟，皆坚辞不就。高启被征修《元史》，最初曾兴奋过一阵子，后来亲眼目睹朝廷中种种景象，热情骤减，不

久即借机辞官归里。朱元璋由此对吴中士大夫更加反感，进而大肆迫害。饶介在平江城破时被俘，随即被押至南京处死；高启因替魏观作《上梁文》被捕至南京腰斩；徐賁因任地方官犒劳路过的军队不及时，下狱死；张羽因故流放岭南，启程不久又有命令召还，自知不免，投龙江死；王行在蓝玉案中被杀；谢肃因事下狱，狱吏用布囊将其压死；金纲任苏州知府，因请求减少赋税额赐死；王蒙在胡惟庸案中被杀；陈汝言被处死；卢熊因所刻印章的“兗”字像“衮”字被处死；袁华因其子为吏犯法，一并被逮至南京处死。其他如杨基因故罚做苦工，死在工地上；袁凯因故下狱，装疯躲过一死，据说是让家人把食物做成大便模样，胡乱吃下，才骗过官府。

总之，张士诚集团的瓦解，使吴中文人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；明王朝对吴中地区经济上的打击，使吴中文人失去了优越的生活条件；明王朝对吴中士大夫的直接迫害，更使吴中文人集团变得七零八落，精英丧失殆尽。剩下的一些成员，如张宪、郭翼等，也在高压统治下战战兢兢，吞声而不敢言，郁郁以终。于是曾经一度繁盛的吴中文学活动也骤然归于消歇，吴中文化元气大伤，直到八十多年后的景泰、天顺年间，才逐渐恢复。

吴中文人集团拥戴张士诚，朱元璋集团则得到了浙东文人的支持。元末至正十八年（公元1358年），朱元璋的军队攻下婺州（金华），次年设立郡学，聘请当地名儒叶仪、宋濂为五经师，范祖干为谕议。朱元璋的外甥李文